

2202



開縣文史資料

(3)



开县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县委员会^编
《开县文史资料》第三辑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九年九月

封面设计：陈东明

封面题字：李道才



编印单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县委员会

承印单位：重庆市万州区文陵印刷厂

内刊准印证：万新出(99)字第 120 号

出书时间：1999 年 9 月

《开县文史资料》第三辑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传国			
副 主 任:	李世平	明 森		
委 员:	刘明国	桑主力	张毓汉	李贤忠
	张高炳	黄文质	廖柏翠	陈立万
	张方明	胡金勇	吴大成	
主 编:	明 森			
副 主 编:	陈立万	张方明		
责任编辑:	胡金勇	吴大成		
编 辑:	温光顺	王代轩	李谦顺	朱占文
	彭世祥			
特邀编辑:	向明阳	朱泽觥	李中正	易学伟
	曾信祥			

序

中共开县县委书记 邓东华

50年，惊涛拍岸。

50年，春风化雨。

历史长河孕育着峥嵘岁月，时代浪花映射着春华秋实。当人民政协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当人民共和国50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开县文史资料（第3辑）》一书，经过县政协有关同志和有关方面的努力，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开县文史资料》第3辑的出版问世，是我县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意义深远，可喜可贺！

此书具有较好的“资政、存史、育人”作用，它忠实地再现了刘伯承元帅“跃马太行”的英姿，记录了我县黄埔同学的历史风云，笔载了我县两个文明建设的可喜成绩，抒发了帅乡人民奋发图强的时代精神和迎香港、澳门回归的自豪、欢欣之情。该书材料翔实，内容丰富，文笔清新流畅，不失为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历史是一面镜子，善于总结才能有所进步。纵观历史风云，真正的落后是人的思想和观念的陈旧。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面对新世纪的召唤和发展市场经

济的各种挑战,深卧于巴山渝水的开县要腾飞,要发展,必须善于总结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得失,以史为鉴,大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走出封闭的文化圈囿,摒弃夜郎自大、因循守旧、自暴自弃等错误的思想观念,张开智慧和勤劳的双臂,拥抱改革开放的春天。惟其如此,我们才抓住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才找到了开启新世纪大门的金钥匙。我想,我们的干部群众倘若能把认识统一到这一道理上并努力去付诸实践,那么开县的繁荣富强、辉煌灿烂就指日可待,而为本书付出大量心血和汗水的全体编纂者们则将感到莫大的欣慰和荣幸。这既是县委的殷切期望,同时,也是喜庆建国 50 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 50 周年的最好的贺礼!

目 录

序	邓东华
---------	-----

人物春秋

叱咤风云 跃马太行	王承哲 (1)
抗日烈士王润波	王一忱 (15)

历史风云

开县黄埔同学及黄埔开县联络组	吴纯青 (23)
----------------------	----------

朝花夕拾

我的青年时代	李高如 (32)
--------------	----------

建设纵横

开县小城镇建设发展纪实	曾信祥 (37)
开县旧城改造扫描	易学伟 (49)
开县盛山公园史话	曾信祥 (53)

教育史话

开县汉丰职中发展纪略	官炳才 (61)
------------------	----------

群团一页

开县残疾人事业发展概况	李永红 (69)
-------------------	----------

时代浪花

开县结防所发展纪实	易学伟 谭先莲 (75)
-----------------	--------------

文化史录

《开县工作》创办始末	李中正 (79)
开县伊斯兰教史略	尹静伯 (84)

迎刘帅铜像抵开县	朱泽航	(90)
杜甫与开县	明 森	(94)
开县广播电视事业的创建与发展	谭武陵	(97)

民俗风情

万福桥碑铭	朱泽航	(109)
“光打条”变猪	明 森	(110)

资料拾零

开州“三绝”	曾信祥	(112)
温泉仙女洞	易学伟	(116)
读《盛山十二景诗》	曾信祥	(119)

迎香港、澳门回归诗文选粹

这里讲述的故事	明 森	(122)
一九九七:历史的一个句号	明 森	(124)
《划时代良宵》等诗词四首	易学伟	(127)
历史的选择	明 森	(130)
《武陵春》《渔家傲》二首	李道才	(133)
《豪言颂》等诗四首	易学伟	(135)
紫荆花吟	明 森	(137)
澳门回归颂	杨建远	(140)

后记	编委会	(141)
----------	-----	-------

叱咤风云 跃马太行

王承哲

刘伯承(1892~1986),开县赵家镇人。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中国共产党七届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连任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进攻中国。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展开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最先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战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刘伯承同志受命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出师抗日,挺进太行山区,转战华北敌后,组织游击集团,实行敌进我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开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屡建奇功。他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誓 师 出 征

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8月,国共合作再度开始,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刘

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张浩任政委。

刘伯承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这场战争不仅是挽救民族的危亡，而且具有世界意义。1937年7月下旬，他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深刻指出：“卢沟桥事变有世界大战的性质。往北直接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往南已严重损害了英、美的殖民利益。日本陆军的重点是对付苏联，海军则是针对美国的。”以后的事实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论断。

9月6日，一二九师在陕西三原石桥镇召开了奔赴抗日战场的誓师大会。

刘伯承和全师指战员一起冒雨参加大会。雨越下越大，他一再拒绝给他披雨衣，他说：“为将者应当‘冬不衣裘，夏不张盖’，全师同志都淋着雨，我怎么能穿着雨衣站在大家面前呢！”刘伯承在大雨中乘马检阅部队后，发表讲话，着重讲了改编“换帽子”问题。他说，“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传统不会变，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说罢，自己首先换了帽子。

最后全师官兵在刘伯承的领读下，集体郑重宣誓。刘伯承领读一句，近万个声音复诵一句。这气壮山河的声浪，回荡在会场上空，显示了一二九师全体将士誓死抗日救国的钢铁意志。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30万人向华北展开大规模进攻。“八一三”日军又向上海大举进犯。在此形势下，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全国出现团结抗战的局面，并形成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军事战略格局。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共产党领

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钳制和打击敌人。八路军的三个师陆续向华北敌后挺进。

9月16日，刘伯承率全师官兵九千余人由三原出发，10月上旬渡过黄河。10日，先头部队七六九团进抵太原。此时，太原正处于东、北两路日军的钳击之中。刘伯承果断命令部队迅速绕向敌后山区，侧击南犯敌人后方。10月19日夜，七六九团采取秘密而迅速的动作，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代县阳明堡机场，焚毁敌机24架，歼敌百余人。这一仗，震惊全国，是刘伯承率领一二九师出师抗日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使猖狂进攻太原屏障忻口的敌军，丧失了空中突击力量，并不得不以相当兵力加强后方守备。这就大大地牵制了敌人，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的忻口战。

一二九师首战告捷，用事实驳斥了“亡国论”者认为“日军不可战胜”的悲观论调，给全国人民以很大鼓舞；也是给猖狂进攻不可一世的日军当头一棒。

在太行山上

刘伯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率一二九师转战同蒲、正太沿线，挺进太行山区。

10月下旬，刘伯承指挥陈赓的三八六旅侧击沿正太路西犯之敌，连续以袭击、伏击和阻击等手段，先后在井陉的长生口和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黄崖底等处，给进犯之敌以沉重打击。其中尤以七亘村连续两次伏击获胜最大。

第一次伏击：10月25日，刘伯承在侦悉向平定进攻的日

军辎重部队夜宿测鱼镇后,判断其第二天必经七亘村,遂派七七二团三营于26日拂晓前进入七亘村以东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待伏,等敌步兵百余人通过后,以突然猛烈炮火袭击其辎重部队,共毙敌三百余人,缴获大量物资,我军仅伤亡十余人。

第二次伏击:刘伯承预料到日军运送物资任务未完成,除七亘村外又无别处绕行;又抓住敌人也熟悉中国古代兵法,认为我绝不敢再在七亘村行动的心理,大胆地在第一次伏击地区又部署第二次伏击。仍派三营在七亘村待伏,于28日又歼敌百余人。

刘伯承敢于以“重叠的待伏”在三天之内,在同一地点,使用同一部队,连续两次伏击同一敌人,并获得胜利,这是他重视侦察,摸透了敌人意图,巧妙地运用兵法,大胆地灵活地驾驭战争的一个实例。

1937年11月,随着太原等地的失陷,在华北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1937年冬,刘伯承和政委张浩、副师长徐向前,率部进入太行山区的辽县(今左权县)一带,建设政权,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刘伯承亲自主办了辽县游击训练班,训练党政军民游击骨干。为此,他撰写了《抗日游击队 and 自卫队的基本任务》、《论游击战与运动战》以及战术等方面的讲稿和论文,并亲自授课。他指出:“正规军是第一个因素,游击队是第二个因素,自卫队(普通的群众组织)是第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相互配合作战是非常必要的。正规军就是这个拳头的骨,游击队是它的筋,自卫队就是它的肉,这样形成一个一致的有机体的动作。这也可以说就是抗日游击队战争的特点。”刘伯承总结了一整套游击作战经验。他把游击战的战术动作基本概

括为三种,即袭击、伏击和急袭。他说,还有第四种叫吸打敌援,这是袭击与伏击的混合运用。刘伯承又推广打麻雀战的创举,创造了战斗队形最分散、战斗单位最小的一种游击形式。

就这样,在军事战略转换的时刻,刘伯承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创造性地发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武装,又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武装了抗日军民。

1937年12月,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和一部分游击队、自卫队粉碎了日寇对我太行山区的六路围攻。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取得了反围攻的初步经验,有力地保卫了新生的晋冀豫根据地,使一二九师开始在太行山区立住了脚根。

“支那第一流的游击队战术”

1938年1月,邓小平接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从此,刘伯承和邓小平这两位亲密的战友在一起并肩战斗达十三年之久。

在刘伯承、邓小平和徐向前的指挥下,一二九师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

1938年3月22日,刘伯承以吸打敌援的战法,在长生口歼敌130余人,击毁汽车5辆。

尤为出色的是1938年3月16日的神头岭战斗。刘伯承又一次采用吸打敌援的战法,以一部分兵力袭击黎城敌人,吸引潞城之敌来援,而以主力伏击敌援军于其必经道路上的山地神头岭,“攻其所必救,歼灭其救者”,仅4个小时战斗,歼灭敌军1500余人,骡马700余匹,吃了苦头的侵华日军,哀叹这

次战斗是“支那第一流的游击战术”。

半个月后,3月31日,又取得了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焚毁敌人汽车180辆,毙敌400余人。刘伯承高度评价了这次战斗的前线指挥员徐向前副师长,赞赏他对敌情的正确判断和精湛的指挥艺术。

太行山根据地的创建和一二九师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使日军大为震惊。于是,纠集3万兵力,分9路向晋东南根据地围攻。八路军总部制定了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的作战方针。

1938年4月16日,刘伯承指挥部队实施了长乐村急袭战,歼敌主力2200余人。此次战斗为粉碎敌九路围攻之关键性战斗。敌遭此打击后,纷纷溃退,八路军各部乘胜追击,将敌全部赶出了晋东南。

挺进冀南平原

1938年初夏,刘伯承奉总部命令,指挥部队挺进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把敌后抗日战争由太行山向冀南平原和鲁西北发展。

针对平原作战的特点,从5月起,冀南军民首先开展了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此后接连对平汉、正太、道清铁路的大破击进行了十三次。刘伯承说:“现代化的敌人离不开铁路,正如吃屎的狗离不开茅坑,总有一天要掉到茅坑里淹死。”破坏交通,袭击敌交通线上的守备部队,成为敌后抗战的主要作战形式之一。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中,刘伯承还依靠群众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等多种战斗形式。

一二九师挺进冀南,引起了日寇的惊慌。1933年1月,

日寇纠集了3万兵力分11路对冀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主力即转至敌侧后，打击敌之补给线及后方守备部队。

刘伯承针对日寇的骄纵狂妄，受挫后急于报复的心理，指挥三八六旅等部以小部兵力袭击威县，而以主力设伏在实施报复之敌必经过的香城固地区，一举歼敌200余人。香城固一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全面“扫荡”计划。

在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战争期间，冀南地区军民一直面临着“前门打虎，后门拒狼”的复杂局面。一方面要对付日寇的频繁的“扫荡”，一方面还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背后袭击。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摩擦。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党中央“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刘伯承说：“我们的干部要学会对付摩擦，叫做‘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失去政治立场’。”当国民党军队闹摩擦时，刘、邓主动同他们会谈；当他们继续挑衅时，则提出警告；只是在顽军得寸进尺，向我军进行军事袭击时，我才被迫反击。其中一二九师发起磁武涉林战役，歼灭顽军朱怀冰部1万余人，即是一例。

百团大战破“囚笼”

1940年以来，日本侵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企图扼杀我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民。

为了打破日寇的“囚笼”，5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了白晋铁路破击战役，给敌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指挥八路军105个团40余万

人发起了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的作战前后共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从正太路破击战开始,以反“扫荡”结束,使日军的“囚笼”政策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的 38 个团和晋冀鲁豫军民参加了正太路破击战役、榆(社)辽(县)公路破击战役、关家脑战斗和反“扫荡”等“百团大战”的全过程。大战历时三个半月,一二九师共进行大小战斗 500 余次,毙、伤、俘日伪军近 8000 名,破坏铁路近 500 里、公路 1000 余里,取得了辉煌战果。

刘伯承在总结“百团大战”经验中指出:“八路军和决死队在华北敌后所进行的‘百团大战’,实质上是敌我之间交通斗争的激烈表现。敌人为作战运输的需要,为控制占领区掠夺人力、物力,交通已成为不可断绝的生命线。如被打破,就必然演成肢解的死亡。交通战对于我们来说,,则或者是让日寇交通线缠死,或者是破坏交通线问题。交通战不单纯含有军事意义,而且包括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总力战的意义。”

刘伯承认为,“百团大战”的意义与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它提高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对于克服投降妥协倾向起了重大作用,给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略以相当大的打击。八路军和决死队这次在华北积极主动的战役进攻,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弱小民族为谋解放而奋斗的人们,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百团大战”给华北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使日军企图进攻西安和重庆的计划流产。

组织游击集团 敌进我进

“百团大战”极大的震撼了日本侵略军。日军迅速调整了作战部署,重新集结重兵进攻华北敌后根据地。1941年春,日军集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侵华兵力于抗日根据地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加上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进一步加重了根据地军民的困难。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刘伯承、邓小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训主力兵团、加强军区建设、发展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建设游击集团。早在1938年秋,他就提出“抗日自卫队、抗日游击队和军区、军分区基本部队三种因素组成有机配合动作的游击集团,是抗日军区的重要内容。”1941年2月,又提出继续发展游击集团,对付日寇的“扫荡”。6月30日,他又写出了《关于游击集团的训令》,指出了游击集团的组织、作用、指挥和优点。在此期间,刘伯承和邓小平指导全区组织了游击集团,加强边沿区的对敌斗争,打破敌人的蚕食和封锁。秋季,组织了全师运动大会,对各部队的整训进行检阅;并进行了邢(台)、沙(河)、永(年)等反“扫荡”战役。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在以前4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独立抗击侵华日军占其陆军总兵力90%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急于抽出兵力“北进”苏联与德军会师,“南进”亚洲太平洋战场对美、英作战。由于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使日军不得不抽出相当大的兵力对付八路军。日军陷于中国战场